

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

张传杰

摘要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舆论调查数据逐渐增多,以及新生代学者的出现,中国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国内学者的三篇近作为代表展开分析,发现相应的研究具有三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即舆论与政策之间具有某种联系,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序的,舆论调查是一种有效测量政治态度的工具。由于学科发展的滞后以及缺少调查数据,目前国内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仍面临诸多亟需解决的难题:数据驱动的研究,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以及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脱节。从长远来看,加强有中国视角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需要长期的多元化的调查数据储备,而在短期内大样本调查数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易得群体的样本,灵活采用不同的调查设计,开展一些小样本研究,这可能是今后几年国内学者可以尝试的科研路径。

关键词 对外政策舆论 舆论调查 政治态度 追踪研究 面板数据调查

相对于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和中国对外政策理论的研究,在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研究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2000 年之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只是零散地出现在学术期刊上,并没有系统地开展此方面的研究。^①2000 年之后,对外政策舆论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更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发表在各重要学术期刊

* 张传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北京 100084)。

** 本研究受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美国对华舆论,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 年第 2 期,第 7—35 页;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兼议“精英舆论”》,《美国研究》,1989 年第 1 期,第 35—49 页;李庆余:《19 世纪末美国公众舆论评述》,《美国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137—143 页。

上,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①

2000年后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发展有两点背景因素。一是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关注的重点从宏观理论向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和微观理论转变,学者们更多地介绍或借用国外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多元的研究方法,试图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建树,构建多个理论岛屿,以期今后这些分开的理论岛屿能够连成一片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过程中规避风险的方式,这种转变带有学科发展的必然性。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既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也是这种转变的体现。二是2000年后国内对外政策民意调查的兴起,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的工具和较多的数据。^②《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等媒体为满足新闻报导的需要,先后发起了中国居民对外政策态度的民意调查,一些调查机构如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等等也开展了中国人看世界的相关民意调查。10多年对外政策民意调查的实践与数据储备,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原材料。

伴随着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发展,国内学者的科研成果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从研究内容上看,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介绍美国的对外政策舆论理论与分析美国的民意测验数据。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们逐渐开始描述、分析中国的情况,研究中国多重公众(multiple publics)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并进而对现有理论提出有益的补充或延伸。^③这些中国的公众群体包括精英人士、学生群体和普通城市居民。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的研究多限于公众舆论理论上的探讨,或借用美国的数据与案例进行描述性或叙述性分析,力图阐释美国某个群体在某个议题上或针对某个国家(中国)意见的分布特征,或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性。随着国内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在认知上的深入,以及中国民意测验数据的积累,他们开始更多地利用现有的数据去做实证性分析,寻求通过假设检验剥离与数据不拟合的因素,找到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规律。同时,多元化的研究工具也极大地丰富了研究问题的范围,对外政策舆论的静态结构、动态变化、稳定性、一致性、群体差异性以及人口社

① 2000年之后国内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成果众多,其代表作如下:余逊达、陈旭东、朱纪平:《中美关系:来自民众的看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6期,第33—38页;王鸣鸣:《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5期,第75—80页;余建军:《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第58—78页;范士明:《“爱恨交加”中的反美主义:冷战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第52—58页;谢韬、梅仁毅:《美国政治精英和公众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与分歧》,《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第26—31页;周弘、刘作奎、范勇鹏:《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1—147页;Chuanjie Zhang, “Affective US Image Predicts Chinese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pp. 293—323。

② 广义的民意调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了,早于对外政策民意调查。参阅李松:《中国迎民调时代》,《瞭望》,2010年8月16日。

③ 参阅范士明:《“爱恨交加”中的反美主义:冷战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周弘、刘作奎、范勇鹏:《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Chuanjie Zhang, “Affective US Image Predicts Chinese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 呼和那日松、张燕等:《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政策态度的调查与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第26—30页。

会经济因素皆成为受关注的话题。谢韬对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观点与政策倾向的研究,陈定定、张莉、王正绪对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因素的分析,以及董礼胜对中国学者对欧盟认知情况的研究,即代表了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方面的一股新潮流。

本文将结合以上诸位学者在本刊发表的三篇近作,分析新生代学者在对外政策舆论研究中的共同特点,包括这些研究中共同的假定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该领域今后发展的方向与具体建议。

一、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假定

与早期学者们介绍对外政策舆论理论或描述美国公众舆论特征不同,新生代学者往往更倾向于直接切入感兴趣的研究问题,通过对民意测验数据的二次分析(secondary analysis),试图找出某些规律性的法则,为对外政策舆论理论的建立与延伸提供证据。谢韬使用了芝加哥外交学会(2006 年后改称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从 70 年代开始采集的美国公众对外政策态度调查数据,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情感因素和对中国威胁的判断均可以解释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陈定定等使用了 2010 年在中国六大城市进行的城市居民关于对欧洲看法的问卷调查,检验了一系列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与城市居民国际信任度的相关性;董礼胜也使用了“2010 年中国人看欧盟”的数据,着重考察了中国学者对涉及欧盟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上的偏好,得出结论指出中国学者对欧盟的态度是模糊与不稳定的。

三篇文章内容看似大相径庭,实则作者们在对外政策舆论研究上都起始于相同的假定。这些假定虽然在文章中没有叙述,却皆是三篇实证研究的理论起点,也构成了对外政策舆论理论的核心观点。

首先,作者们都认可在舆论以及对外政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V. O. Key 提出,舆论对政策而言,相当于一系列拦水坝,为政策制定圈定了某些外围界限,最终的政策结果很难突破舆论设立的界限。这种说法基于美国政治中的民主代表理论,即选民会用选票迫使政治家接近选民的立场,政治家主动让政策与舆论趋同,也称“民主响应论”(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以及外交精英人士,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性通过大众传媒主动影响、领导、塑造甚至操纵民意,为某些对外政策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②美国学者通过分析民意测验数据,发现

① V. O. Key,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61.

② 这些学者通常被称为“意见领导学派”,有关代表作可参阅:Lawrence R. Jacobs and Robert Y. Shapiro, “Presidential Manipulation of Polls and Public Opinion: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ollster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4, 1995—1996, pp. 519—538。

公众舆论与政策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但是很难区分这种相关性是由“民主响应论”导致的,还是政治家领导民意的后果。^①实际上,“舆论领导论”本身并不意味着对舆论作用的否认;相反,它正是政治家重视舆论的一种反映,他们力图让舆论与政策趋同,从而使政策更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领导舆论虽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民众对某项政策的支持,但长期来看是把双刃剑,有可能会伤及政策合法性甚至政府的信誉,典型的例子即美国政治中的“团结在旗帜下”(rallying around the flag)效应,特别是布什政府 2003 年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所做的大规模舆论准备。

尽管从舆论到政策的机制还没有厘清,国内的新生代学者都认为对外政策舆论是有其政治意义的,必然会通过某个进程反映到对外政策的结果上来。由于政体、文化、政策领域、信息、权力等方面的不同,舆论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联系模式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舆论对对外政策至少有最基本的限制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研究舆论的形成、特征与变化,这不仅仅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对政策决策过程的了解或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其次,作者们认同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具有一致性与稳定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肇始,伴随着学者们对外交精英人士舆论的崇尚和肯定,与对普通民众舆论的怀疑和否定。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就曾指出,美国民众在对外政策上不会有理智的判断,因为他们易受情绪支配。^②二战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心情理论”(Mood Theory),指出美国民众的对外政策态度既没有智力结构,又缺少事实内容。^③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 Philip Converse 在 60 年代对 1958 年美国国会选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民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态度自相矛盾,没有一致性。^④三位美国学者对普通民众理解、分析对外政策问题的能力表示了强烈的疑虑,从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呼应了现实主义学者摩根索对民众缺乏思考外交事务能力的担忧。^⑤

早期舆论研究对民众思考外交事务能力的悲观论调,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受到普遍批判,也开启了学术界研究民众对外政策舆论的热潮。William Casparay 首先发难,他检验了 1942 年至 1954 年间国家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① 参阅 Benjamin I. Page and Robert Y. Shapiro, "Effects of Public Opinion o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7, No. 1, 1983, pp. 175—190; Alan D. Monroe,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Policy, 1980—1993",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2, No. 1, 1998, pp. 6—28。

② Walter Lippma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2。

③ 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1950, p. 69。

④ Philip E. Converse,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⑤ 有关三位美国学者对民众思考对外政策问题能力的质疑,被称做“Almond-Lippman Consensus”或者“Almond-Converse Consensus”。参阅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1992, pp. 439—466; Chuanjie Zhang, "Affective US Image Predicts Chinese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 p. 295。有关摩根索的论述,参阅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Center) 的数据,发现其间美国民众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态度,在一系列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并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① 其后的近 30 年时间里,更多的学者们发现,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数据在多维空间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备某种特征分布,可以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维度来解释。^② 这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政治学家 Eugene Wittkopf 和其他学者对芝加哥外交学会民意调查数据所做的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他们检验了近 20 年的数据,发现美国普通民众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可以用两个变量来解释,即合作国际主义(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ism)和军事国际主义(militant internationalism)。^③

本刊三篇文章的作者都继承了对普通民众对外政策舆论的乐观看法,认为普通民众在对外政策上的看法具备某种结构,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其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法则值得研究的。谢韬文章的一个结论就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陈定定等的文章则是寻找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度的解释变量,其前提假定是中国城市居民的国际信任度在某些条件下有一定的预测性;董礼胜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者可能更接近于精英群体而非普通民众,但是“中国人看欧盟”项目也有普通民众看欧洲的相关其他研究。理论上,三位学者都应该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外交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对外政策舆论在内容上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只是基于两个群体在三个因素上的不同,即信息(information)不同、兴趣(interest)不同、影响力(influence)不同,又可称之为 3i 因素,但这不能否认普通民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思考的能力。

最后,作者们都认为舆论调查是测量政治态度的一种有效工具,所以可以通过舆论调查数据来研究政治态度。对作者们而言,对外政策舆论的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舆论是公众表达出来的态度,二是这些态度与对外政策相关。对外政策态度即是政治态度的一种。态度是人们对某些人、事务或观念的持久的评价,^④亦即态度不是一种随机产生的结果,而是人们内心持久存在的某种偏好。质疑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一些人认为,在舆论调查阶段,受访者有可能随口说出答案,而未必是他内心真实态度的反映;又或受访者根本没有持久的态度而随口说出答案。而研究舆论的学者皆认为,从技术层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舆论与态度分离的情况。比如,如果舆论调查确实存在系统的舆论与态度背离或态度缺失的情况,那么受访者大规模地虚假(随机)反映态度可以通过信效度测验来甄别。本刊的几位作者实际上是在

① William Casparay, "The 'Mood Theory':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2, 1970, pp. 536—547.

② 关于美国对外政策舆论维度研究的总结,参阅 Chuanjie Zhang, "Affective US Image Predicts Chinese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 pp. 296—299.

③ 有关 Wittkopf 等学者对芝加哥外交学会舆论调查数据的分析不另赘述,其中的代表作品请参阅 Eugene R. Wittkopf, *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Elliot Aronson, et al., *Social Psychology*, N. J.: Prentice Hall, 2002, p. 217; Barbara A. Bardes and Robert W. Oldendick, *Public Opinion: Measuring the American Mind*, 3rd ed.,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7, p. 12.

舆论调查与政治态度之间划了等号,默认在正确的抽样方法、严谨的问题措辞、合适的采集方法之下,我们可以测量到公众的对外政策态度,从而利用舆论数据深入进行相关研究。

二、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挑战

在美国学界,系统地研究对外政策舆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与芝加哥学会从1974年开始在美国公众中进行对外政策舆论调查的时间基本吻合。国内学者对相关理论的介绍始自80年代后期,直至2000年后才能在国内各类重要学术期刊上见到更多的学术著述,国内的相关舆论调查也是在2000年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由此两点判断,国内的研究滞后美国30年左右。因为可以借用国外的理论、方法与数据,所以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发展享有“落后的优势”,在初期能快速地追赶国外的同行。而从本刊三篇文章来看,国内学者已经成功地从最初的理论介绍阶段,发展为利用数据特别是国内采集的数据、结合中国实力增长的现实来突出我们自己的科研兴趣、视角和观点。尽管我们距离理论创造尚有距离,但许多独特的实证性发现有汇集成归纳性理论的可能。

本刊的三篇文章也揭示了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外政策舆论研究领域共同面临的四点难题与挑战,其中有些问题是国内学者特有的,有些问题是所有对外政策舆论学者需要思考、但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尝试解决的。

第一,由于国内对外政策舆论调查数据的缺乏,新生代学者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甚至回避了政治学界方法驱动研究或是问题驱动研究的争论,不得不将自己的科研局限于一隅,进入数据驱动研究的模式。^①有什么样的数据做什么样的研究,甚至使用的方法也受到数据的束缚。

本刊文章的作者们,深受政治学科行为主义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可观测的数据,检验可证伪的假设,探寻数据背后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法则。行为主义的影响使得新生代学者能够超越早期国内学者的理论介绍与描述性、叙述性研究,结合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数据,找到可行的研究课题。然而也正是这种行为主义的影响,当可观测数据严重不足之时,研究全然围绕现有的数据为中心而展开,极大地影响了研究的范围甚至结论的可靠性。这点从本刊的两篇运用中国人对欧盟态度调查数据的文章中可见一斑,单一问卷的束缚使得我们无法做出趋势性判断,问卷问题容量的束缚使得变量控制几近无可能,更多时候限于分析某个问题的人口社会经济

① 最新的争论是2000年以来政治学界的“改造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不少学者号召政治学研究需从方法驱动的研究转变为问题驱动的研究,提倡方法多元化。有关主张参阅 Kristen Renwick Mon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an Shapiro, *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因素,而缺乏分析对外政策舆论的结构与变化。谢韬的研究在内容与分析上之所以更丰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内容与储备。

目前国内相关数据的存量不能满足科研发展的需要。例如,国内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从 1995 年开始做了一系列中国人看世界的调查,在新闻报道中能看到一些描述性统计量,但原始数据库一直未能与学界分享,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措辞与内容也未必适用于学术研究。再如,最近较完整的调查数据包括受欧盟资助的中国人看欧盟的调查,国内学者利用调查数据撰写了不少科研成果,包括本刊的两篇文章,但调查数据的可用性也有一定局限。

第二,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受到制约。内在效度一词原指在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中,建立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可信性。^①用在这里,特指在对外政策舆论数据分析中,所用的统计方法是否可以确保结论的可信性。

首先,在回归方法的运用上,当我们的解释变量中有核心变量与控制变量之分时,基本的步骤应该是先做核心变量的回归,再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观测核心变量系数在统计显著性与实质显著性上的变化,而非简单地把所有的数据一次性加入回归模型中,将最后的结果笼统汇报。

其次,在应用统计方法之前需要核实该方法的可行性,即该方法的假定前提。例如,多元回归分析的标准化系数 Beta,只是为了在某种形式上统一不同单位变量的影响度,将不同的衡量单位均改为以变量自身的标准差为单位,对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的推断似无太多帮助;对标准化后变量的最佳利用也是以原变量是否接近正态分布为前提的,否则标准化后变量的标准差很难解读。

再者,在研究舆论百分比变化的时候,因为舆论调查数据的限制,我们往往忽视总变化量(gross change)与净变化量(net change)的区别,总变化量小并不一定代表净变化量小。^②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为例,假如问题只有两个选项即好印象与不好印象,T0 年在 1000 人组成的总体中,有 550 人有好印象,450 人印象不好,好印象率为 55%;T1 年在这 1000 人的总体中,选择好印象的有 450 人,550 人选择了不好印象,那么我们记录好印象率为 45%,相比 T0 年的好印象率,总体上比上一年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但是总体的变化量并没有反映出净变化量,而在这个例子中的 T0 年好印象人群中,在 T1 年下降的净变化量可能是在总体的 10%—55% 之间的任意数字。在最极端的情况下,T0 年持有好印象的 550 人在 T1 年全部转变为不好印象,而另外的 450 人在 T1 年全部转为好印象。如果净变化量很大而总变化量很小,我们就很难认定对华印象在 T0 年与 T1 年之间具有稳定性,相反却构成了典型的舆论剧烈波动案例。上述三个例子皆会影响统计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学者们需要格外

① 关于实验研究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与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探讨,参阅 Donald T. Campbell, et al.,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 McNally, 1963。

② Ian Plewis, *Analyzing Change: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Chichester: Wiley, 1985, pp. 16—17。

注意,不仅要实证发现呈现给读者,还需要交代方法的局限与弥补局限的可能途径。

第三,对外政策舆论研究外在效度的局限。所谓外在效度,是指实证研究发现的规律性法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或者能否推广到其他人群或案例上。在舆论研究中,影响外在效度的因素主要是研究总体与抽样技术,两者皆与调查设计相关。从研究总体上说,美国的舆论调查多是全国范围内的调查,一般是全国的成年民众或者选民,因此数据分析的结论可以用于推断全国范围总体的特点。国内目前的对外政策舆论调查还未能推广到全国范围,因为经费及后勤上的限制,目前能见到的对外政策舆论调查大多局限在几个或十几个大城市,缺乏对偏远地区的调查。有美国学者认为,如果要研究舆论与政策的关系,我们更应该多了解特定人群的想法而非全体民众的看法,因为在政治上起作用的舆论与大众的舆论可能会有所不同。^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对大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在理论上不会对某些结论构成根本性的破坏,但是在结论部分一定要强调实证发现可推广的局限性。比如陈定定等的文章,调查的总体是六个大城市的城市居民,那么他们的结论只局限于这六个城市的居民。如果六个城市在国内城市中具有很高的代表性,^②那么大体上也可以说这是有关中国城市居民的研究,却不能笼统说成是国内居民的调查。此外,不同的抽样技术也会影响样本与总体的偏离程度。因为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学者们多是进行数据二次研究,所以大规模调查中的抽样技术选择应交由专业机构负责。

第四,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问题导致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脱节。所谓结构效度,是指我们使用的测量工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被测量的理论概念(即结构)相一致。就对外政策舆论研究而言,结构效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厘清被测量的理论概念究竟是什么,二是在技术上用多种测量工具去测量多种特征,并检验多种测量工具是否测量的为同一个结构。^③后者是容易解决的,大多数学者会选用多重指标,然后做因子分析以及信度值 cronbach alpha 检验。前者是最难解决而又最易被忽视的,需要学者在理论上精益求精,掌握理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区分相似概念之间的不同点。比如谈到对外政策舆论的理性与稳定性,需要明确界定这两个概念,以及如何利用现有的舆论测量工具判断理性与稳定性的存在与否。又如在陈定定等的文章中,核心概念是受访者的国际信任度,舆论调查中的问题涉及被访者对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以及俄国人的信任,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国际信任指的是对其他国家的信任度还是对其他国家公民的信任度?国际信任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如何从受访者对四个国家公民的信任度构建起来的?上述两个例子

① Philip E. Convers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1, supplement, 1987, S12—S24.

② 六个城市对中国所有城市的代表性也绝非不证自明,需要作者在许多常用的社会经济变量或其他有意义的变量上将六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做统计比较。

③ D. T. Campbell and D. W. Fiske,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56, No. 2, pp. 81—105.

皆涉及结构效度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使实证研究脱离理论研究的轨道,有成为简单数据挖掘的风险。

三、对外政策舆论研究发展的展望

针对国内学者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现状及挑战,笔者提出以下展望。如果以下方面在未来能够得以发展,加上学者们的辛勤努力,此研究领域一定可以结出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外交事业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做出贡献。

对外政策舆论研究本身是一个很强的实证研究领域,需要大量采用科学方法取得的数据为科研提供保障。而舆论调查本身容易受到市场垄断的干扰,因此主持舆论调查的机构需要向多元化发展,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个别调查者因为其本身的立场或动机使舆论数据发生偏差。有偏差的舆论调查数据不仅对科研不利,更严重者有可能会为决策者提供错误的根据,造成决策者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错误知觉甚至做出误判。比如,美国在对外政策舆论调查方面经过较长的实践,具备较完善的经验,发起对外政策舆论调查的机构包括商业调查公司如盖洛普公司(The Gallup Organization),外交智库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大学科研机构如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国际政策态度项目(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Policy Attitudes),社会政治团体如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以及众多的媒体机构。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尚需假以时日。

在大样本数据缺失或储备阶段,学者们可以考虑利用某些小样本数据关注对外政策舆论的内在特征、形成因素和变化动因。这个过程其实是牺牲研究的外在效度、提高其内在效度的方法,即利用身边易得的特殊群体样本,检验各种理论假设。在不拘泥于外在效度的基础上,学者们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调查设计。

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因此对外政策舆论在很多时候会呈现明显的事件驱动特点,从而造成舆论波动甚至大起大落。^① 如果需要研究宏观舆论的变动,则可以借助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手段。追踪研究的方法易于实施,每次调查问题不多,能够把握舆论的总体变化。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盖洛普公司从 1979 年起,先后 29 次使用相同的问题调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特别是 90 年代后基本上每年调查一次,为研究美国公众对华态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序列数据。

如要研究舆论在微观层面上的变化,学者们可以通过追踪固定的人群采集面板数据(Panel Data)。这种调查指针对同一个样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点上进行

^① 关于上世纪 90 年代及 2000 年后美国民众对华印象起伏的描述,请参阅张传杰:《公众舆论中的中美关系:相互印象与政策选择》,载孙哲主编:《后危机世界与中美战略竞逐》,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年,第 70—92 页。

重复的调查。面板数据调查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舆论的总变化量,还可以了解净变化量。什么人的观念变了?什么人的观念没有变?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了观念的改变?该方法对研究舆论变化的机制有极大的帮助。当然面板数据调查的最大问题在于多个时间点上的样本流失,减少样本流失数量对研究的影响可以通过增加第一次调查的样本量来实现,但如果样本流失具备某种系统性,则会使整个研究的结论发生偏差。

对于上述研究中产生的带有因果关系的结论,还需进行实验研究或准实验研究,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对实验群体人为地改变某个解释变量,观察反应变量上的变化,以确立因果关系。实验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一些政治学者将之用于研究国家形象的感知,其成果对理解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具有很大的启发性。^①

综上所述,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大样本的调查数据,但是在大量调查数据暂时不能获得的情况下,利用易得群体的样本,可以灵活地采用不同的调查设计开展一些小规模的研究,待日后再用大样本数据验证,这可能是今后几年国内学者可以尝试的科研路径。

四、结 语

中国即将迎来公众舆论研究的崭新时期,建立“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②是与建设和谐社会政策相一致的。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公众舆论,对外政策舆论有高度的特殊性,需要学者们全面、深入、科学地了解其特征、形成与变化,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打造中国学者特有的视角、问题与方法。

本刊的三篇对外政策舆论文章是国内新生代学者的最新科研成果,它们具有显著的共同特征,从具体的科研问题入手,运用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分析大样本舆论调查数据,检验可证伪的理论假设,从而发现对外政策舆论中的规律性法则。由于国内相关研究仍然落后于国外,以及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缺失,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限制。但是瑕不掩瑜,三篇文章在本刊同时发表,显示了该领域的学者队伍正在蓬勃发展。他们抱着同样的信念,从相似的理论假定出发,在不同的研究问题上获得了颇具价值的实证发现。笔者希望以本刊为学术新坐标,抛砖引玉,让此类研究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与科研兴趣,共同建设有中国视角的对外政策舆论研究。

(责任编辑:陈志瑞)

① Richard K. Herrmann, et al.,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3, 1997, pp. 403—433.

② 《胡锦涛强调:深刻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1版。